

第一章 引 论

第一节 人口问题的空间视角

一、人口学的视角扩张

索维(1978年)在提及人们普遍对人口问题熟视无睹时形象地比喻道,只有当我们感觉到膝盖疼痛或膝关节动作不灵时,才会想到我们的膝盖。然而翻开我国人口思想史著作,我们发现,自西周以来,关于“民众”、“丁口”、“多乎寡乎”、“福兮祸兮”的议论此消彼长缠绵不绝(吴申元1986年),可见我国人口成为问题已非一朝一夕,察其痛楚者也早非寥寥无几了。

不过长期以来,中国先哲们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和议论大多局限于人口数量之多寡及其与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相称与否。或以为“人者邦之本”、“民众则国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或以为人多乃“乱世之由”、人满则滋生忧患。这些经典的人口思想大抵可归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南亮三郎(1984年)认为,西方的传统人口学也孕育于政治经济学,从波太罗到马尔萨斯,经济学家们无不对人口问题细针密缕,大题大做。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为新古典主义学派所垄断,以杰文斯和门格尔为代表的这一

学派竭力否认人口问题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认为“人口理论不属于经济学直接问题的任何部分”，人口学从此被经济学所抛弃，沦为“孤儿”。南亮对新古典主义学派排挤人口学的原因并未展开说明，不过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新古典经济学派标榜“边际革命”而人口变动有自身的规律和巨大的惯性，对经济变量的反应并不灵敏，因而很难用边际效应来解释。

但是，人口学并未因此而消沉。相反，社会学家、生物学家、统计学家等共同收养了这个“孤儿”，从而使人口学及其各个分支——人口社会学、人口生态学、人口统计学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步形成与经济学平起平坐的一大学科。到 20 世纪 30 年代，当凯尔斯重整马尔萨斯的旗鼓，恢复人口问题在经济学中的“合法席位”的时候，人口经济学已成为人口学的重要分支、人口学与经济学的共同财富和交叉研究领域。

实际上，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口学的繁荣发展并不仅仅是南亮所描述的“一家抛弃，众家收养”的偶然事件，而是人口学以迅速膨胀的全球人口为“人梯”，学科地位逐步上升，学术视角不断拓宽的过程。

当今人口学的分支不下 10 余个，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时间(内在)结构(外在)关系和空间四向视角(图 1-1)。

人口学的时间视角注重人口的数量变化过程，是传统人口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在马尔萨斯时代，对人口是时间过程的认识尚局限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这样的外在描述，现在的情形已大不一样。20 世纪以来，由于人口统计制度的完善和数学模型的广泛引入，人口学家开始系统地探索出生、死亡等生命过程的宏观机制，有关人口问题的系统辩识和发展预测方法得到了根本性革新，生育模式、生命表、人口控制论等技术

和理论的形成和完善成为人口学迈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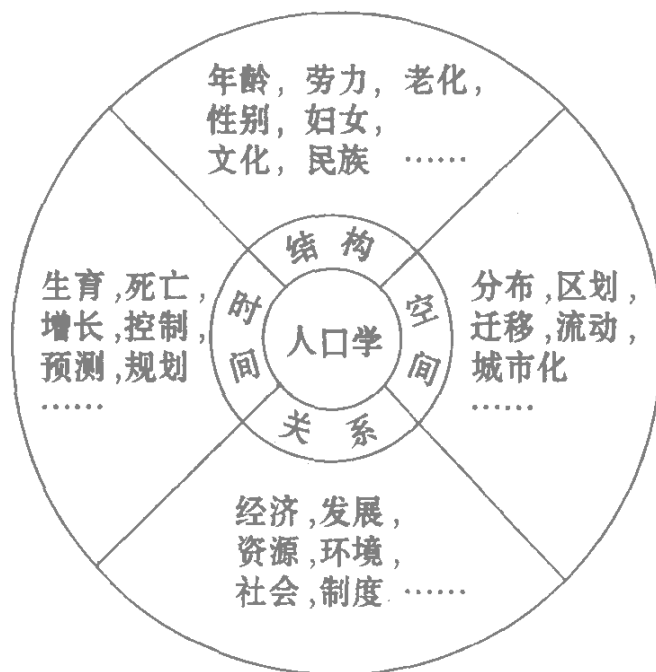


图 1-1 人口学的四向视角

人口学的结构视角主要研究人口的内在属性，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文化等方面。人口结构是人口群体及其所处发展阶段的内在表征，由此派生的人口热点问题包括劳动就业、老龄化、妇女、儿童、民族、教育等。随着人口结构的现代化和人口普查指标的多样化，人口结构的研究热点将不断转移，研究内容也将日益深化。

人口学的关系视角主要研究人口与自然、社会的外在联系，是人口学与其他学科交织最频繁的研究领域，相关学科的研究状况不同程度地影响这些交叉学科的发展。目前学术体系较为完整的分支有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和人口生态学等。

人口学的空间视角侧重于研究人口分布、迁移和城市化等空间过程，是人口地理学的核心范畴。个人和人口群体都占据

特定的空间位置，以特定的地区为生存条件和活动范围，人口对于地域空间的这种依着性决定了对人口问题的全面考察离不开空间视角。正是基于这一点，本书拟从笔者对我国及胶东等地区的实际研究出发，系统地考察人口空间过程的机制和模式，探索区域人口分析的新思路。

二、人口空间过程：地理学与人口学的交叉领域

人口空间过程就是人口群体的数量和属性在特定地域形成的空间结构及其动态变化，这类问题传统上定义为人口地理学问题。对于人口地理学的学科位置，地理学家们的见解各不相同。巴尔（Bahr 1983 年）归纳了 6 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图 1-2）。

特莱瓦萨（Trewartha）把人口地理作为地理学的鼎足之一，认为人口、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是地理学的三大研究对象。这位美国地理学界的领导者给人口地理学以崇高礼遇，有力地推动了 50 年代欧美人口地理学的研究。

更多的地理学者理智地把人口地理学置于人文地理学之中。帕芬（Paffen）认为，人口地理学与人类地理、社会地理一起构成人文地理学的基础，而建立其上的是文化地理和更上一层的聚落地理、经济地理和商业交通地理。哈恩（Hahn）认为，人口地理是综合人类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的分支和分析人类地理学的基础之一。舒勒尔（Scholler）则认为人口地理更接近生态地理。托迈尔（Thomale）提出了人文地理学的三级学科体系，认为人文地理学的第一级“硬核”是经济地理学、聚落地理学和交通运输地理学，最上层的三级学科是应用性的区域地理学，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外围基础学科，包括政治地理、社会地理和人口地理。鲁伯特和沙弗尔（Ruppert, Schaff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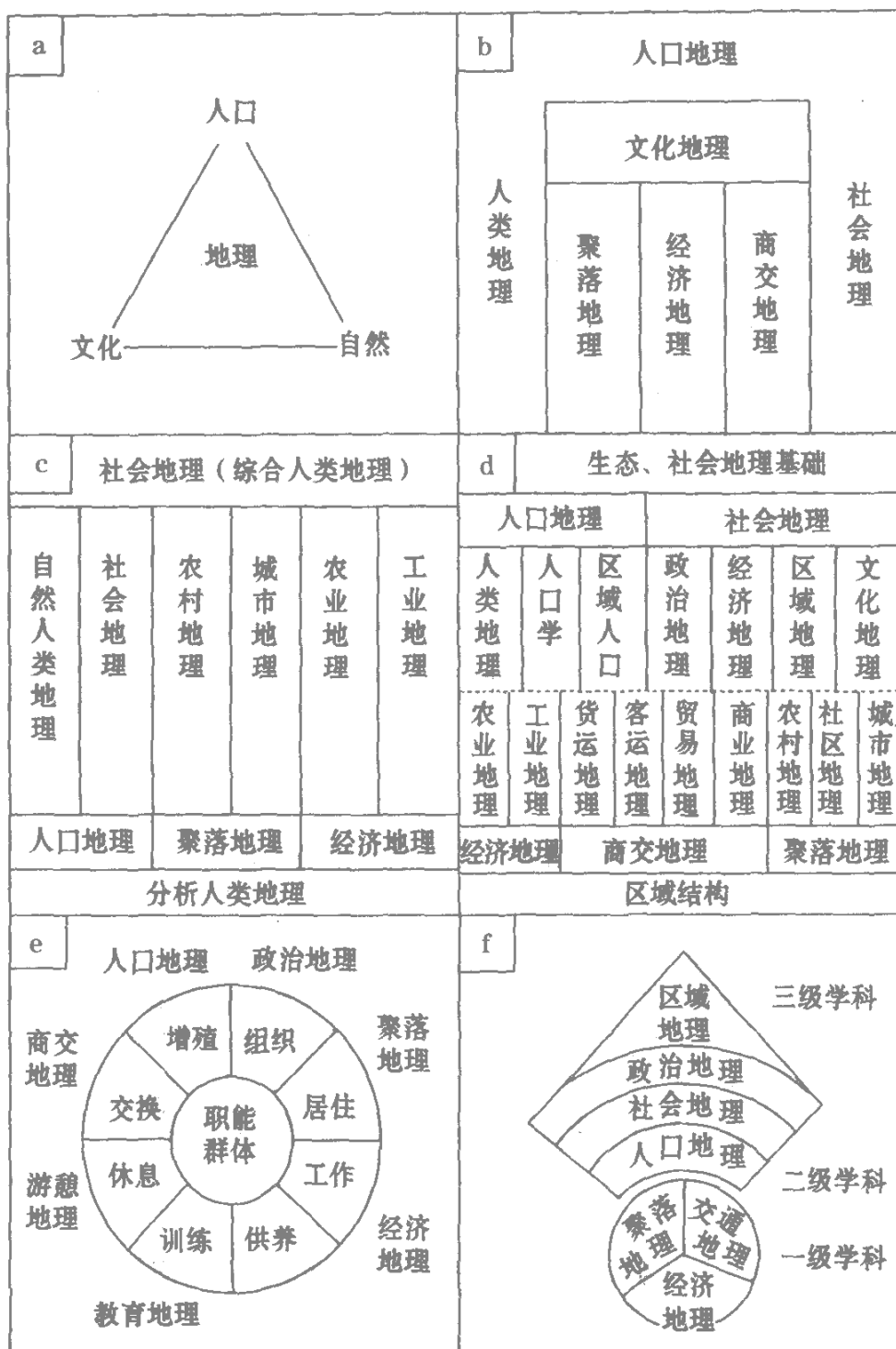


图 1-2 人口地理学在地理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a. 特莱瓦萨(1952年); b. 帕芬(1959年); c. 哈恩(1957年); d. 舒勒尔(1968年);
 e. 鲁伯特和沙弗尔(1969年); f. 托迈尔(1972年) 资料来源: Bahr(1983年)

从人群的职能表现角度出发，构造了人文地理学的“法轮”，其中的人口地理学是与人群的增殖行为有关的学科，也就是研究地域空间上的人口增长问题。

这些观点尽管出发点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把人口地理学作为地理学或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忽视了它与人口学的重要联系。换句话说，尽管人口地理学在概念上经常被定义为人口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但具体操作中仍然被视为地理学的“私有财产”。

事实上，地理学主要研究自然、人口、文化、经济等地理要素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变，而人口学是从时间、结构、关系、空间等四向视角观察人口的，因此以人口空间过程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人口地理学自然处在地理学与人口学的交叉叠置领域中（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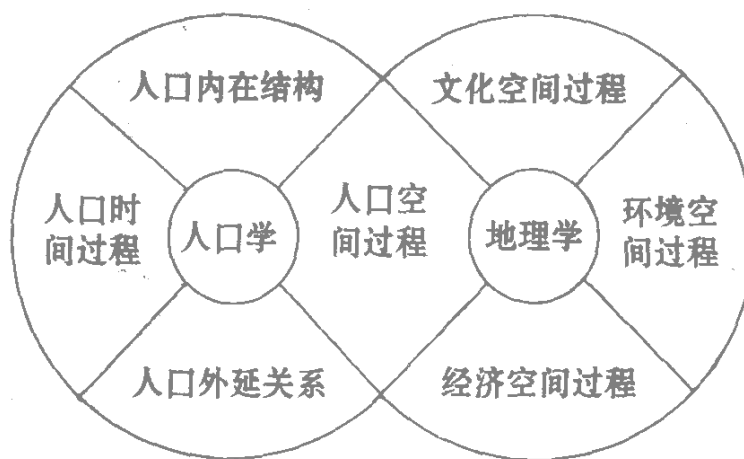


图 1-3 作为人口学与地理学交叉领域的人口空间过程

关于人口地理学研究内容的“宽”与“窄”，学术界的意见也不一致。特莱瓦萨认为，人口地理学主要研究人口地域差异，包括历史人口地理、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三方面问题，其中尤以人口数量问题为要，内又分为世界人口模式、人口数量

动态、地区人口过疏过密等五项内容，人口质量则包括自然素质和社会经济素质两项内容（图 1-4，Pacione 1986 年）。特莱瓦萨体系已经代表了“宽派”的设想，而祝卓（1991 年）的体系中更包括从人口地理学导论、人口地理思想史到行为地理、疾病地理、人口制图学等 17 个分支学科，进一步超越了特莱瓦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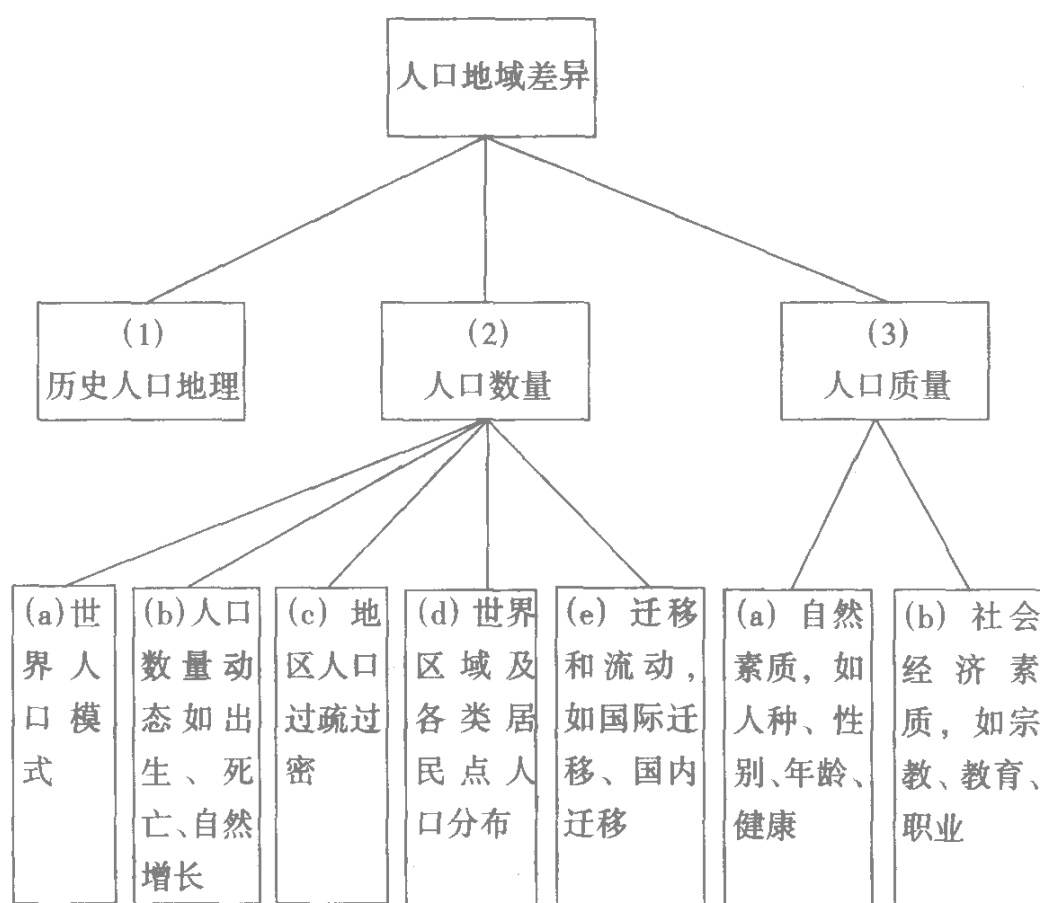


图 1-4 特莱瓦萨的人口地理学体系

资料来源：Pacione（1980 年）。

从空间结构及其动态机制的角度来看，人口空间过程主要包括人口分布、人口迁移和属性转化三方面。人口分布和迁移是人口空间过程的静态和动态表现，人口属性转化虽然不是直

接的人口空间运动，但可以导致人口属性的空间格局发生变化，例如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客观上造就了新的人口城乡分布格局。

无论是分布、迁移还是转化，都可能既包括数量问题，又包括特莱瓦萨定义的“质量”问题。但是人口问题是统计现象，所谓人口“质量”并非确指某个个人的体质、智商、收入、职业等状况，而是表示特定地域上某类人口的统计特征。在这里，个体人被视为具有特定属性的不可分割的“粒子”，任何人口“质量”问题都是通过对“粒子”的统计构成来定义的。比如，文化“质量”以识字人口比重表示，经济“质量”以各产业人口所占比例表示，等等。因此，人口空间过程归根结蒂是人口数量的空间过程。

第二节 人口地理学的历程

一、拉采尔与里文斯坦的开创

在南亮开列的人口学“养父”名单中显然遗漏了地理学家，因为正是从 18 世纪 80 年代起，地理学者在人口领域孜孜以求，奠定了人口地理学的基础。

人口地理学孕育于人类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因此多数的地理学者把人口地理学的根源追溯到人文地理学的鼻祖拉采尔(F.Ratzel)那里。拉采尔于 1882 年出版了《人类地理学》第一卷，开创了人类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Ratzel 1909 年)。1891 年，该书的第二卷面世，这一卷的副标题为“人类的地理分布”从而也实质性地开创了人口地理学。

拉采尔是以纯自然主义的眼光来观察人类及其地理过程

的。他认为人类是与一般动植物一样值得地理学家研究的地表生物层，他们活动于某个特定的自然限区，占据地表的一定地方，需要相当的空间维持生存和发展。人类在充填地球的过程中也加工了地球表层，创造了自己的历史（Brunhes 1920 年）。

拉采尔重视人类扩散过程的历史考察，认为人类越过楚科奇海到达北美洲后的散布过程是呈同心圆状扩张的，从而生成一些历史圈层。他认为美洲大陆代表了未来人类活动空间拓展的方向。

拉采尔总结了当时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他在欧洲和美洲的考察资料，对决定人类分布的自然因素——从海拔、地貌到气候、植被——作了全面的阐述。拉采尔经常用插图把一些地区的人口密度等值线与该地的等高线、等降雨量线、森林分布界限、喀斯特分布区等相叠置，尽管这些插图的表现力尚欠火候，但用它们来支持当时的地理唯物论思想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与拉采尔同时代的研究人口迁移问题的英国学者里文斯坦（E.G.Ravenstein）是人口空间学说的另一个开拓者，然而或许由于他的非地理学家身份，人们在回顾人口地理学的历史时往往将他拒之门外，这是令人遗憾的。里文斯坦致力于“迁移定律”（Principles of migration）的研究。1876 年他在英国《地理杂志》第三卷上发表了《出生地与迁移》的论文，1885 年又在《统计学会会刊》第四十八卷上发表了《迁移定律》的长篇论文。这一定律的主要内容可总结为 11 条（Woods 1979, 侯文若 1988 年）：

1. 大多数迁移者只作短距离迁移；
2. 迁移过程是分步进行的；

3. 长距离迁移者大多愿意去某个工商业中心；
4. 每个迁移流产生一个补偿性逆流；
5. 生长于城镇的居民不如农民易迁移；
6. 在出生地附近的小范围内，女性比男性更易迁移，但是远处闯荡者以男性居多；
7. 多数迁移者为成人，未成年家属很少迁移出县；
8. 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成分中，迁移超过自然增长；
9. 人口迁移量随工商业的发展和交通设施的改善而增长；
10. 迁移的主要方向是自农业地区往工商业中心；
11. 主要的迁移动机来自经济因素。

就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来看，里氏的“迁移定律”除了少数几条（如 2、4、5）值得商榷外，大多数仍然适用，尤其是城市化方兴未艾的发展中国家。里氏的这种“一步到位”的开拓，使得后来相当长时期内地理学家对人口迁移问题感到“有景道不得”，他们或者一遍遍地重复里文斯坦的迁移定律，或者干脆避而不谈。

二、布拉什的接力

20 世纪 20 年代，法国人文地理学家布拉什（P.V.Blache）继承和发展了拉采尔的思想体系，将人口地理学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人文地理学原理》（Blache 1926 年）一书中，布拉什把人口分布问题置之卷首，以六章的篇幅论述了世界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inequality：指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和不协调性（anomaly：指人口与自然环境容量的匹配程度的地域差异），人口群的类型和密度增长，人口迁移及其原因，以及非洲、亚洲、欧洲、地中海几大人口集团的人口地理特征与形成过程等。

布拉什重视人口分布的宏观研究，认为只有从全球综合的角度来考察人口分布的差异对比和不协调性才更有意义。他编制了当时的世界人口分布图，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全球人口问题的地理学家。

布拉什重视自然环境，特别是水热条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他认为东亚季风气候区是地球上最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地区之一，因此这里的人口增长特别快。

与拉采尔不同的是，布拉什并不是一味地到地理环境中寻求人口增长和分布问题的解释，而是强调人文现象的非确定性。布拉什指出，一个老练的庄稼人能根据土壤和气候条件估测农作物的收成，但一个地理学家却不能用类似的方法来推断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在对比印度、缅甸、老挝等国家及其内部的人口分布格局后，布拉什指出，自然环境同样良好的两个相邻地区，它们的人口增长速度往往并不一致，甚至相差悬殊，如果没有人类自身的努力，仅凭自然优势不可能产生人口分布上的高密度。

布拉什强调人口分布的动态性，认为人口分布形态总是暂时的，是不断变化着的多种复杂因素在特定时期作用的结果，因此过程和动机在这里得到了至少是概念上的重视。在美洲，全能的地理学家亨丁顿（E. Huntington）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也“生产”了一批人文地理学作品，虽然他在环境决定论的路上走得更远，但他对亚洲特别是中国人口问题的实地考察格外细心。亨丁顿编制了 1910 年中国高层文官的出生地比重等值线图，以支持他的中国北方与南方人文景观差异和长期对峙的观点（图 1-5），颇值得中国地理学者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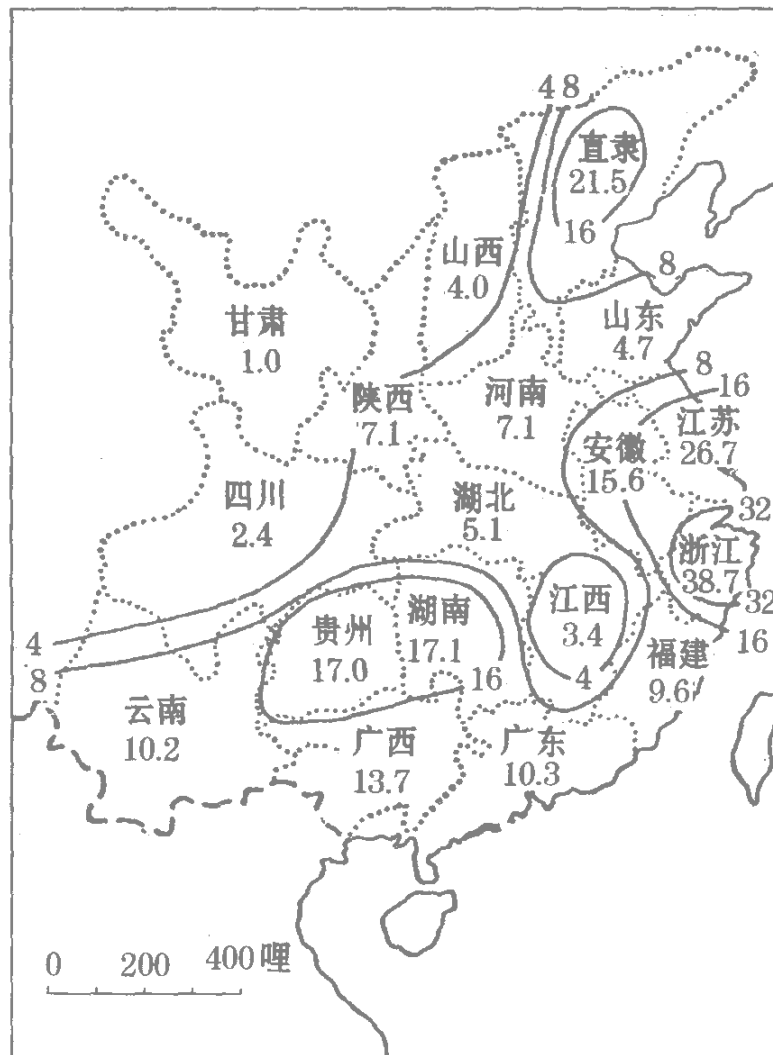


图 1-5 亨丁顿的中国高层文官省籍分布等值线

注：图中数字为 1910 年各省籍高等文官占各省人口的千万分比。

资料来源：Huntington (1924 年)

三、自立与发展

20 世纪 20 年代的人文地理学并不总是包含人口地理学问题，在白吕纳 (J. Brunhes) 的人文地理学体系中几乎见不到纯粹人口问题的内容。因此这一阶段也是人口地理学酝酿自立门户的开始，关于人口地理学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何时何地，

没有准确的说法。1906年，德国人文地理学者施吕特尔(O. Schluters)出版过介乎人文地理学与人口地理学之间的“中间产品”——《人群地理学》；1926年日本地理学家麦谷龙次郎发表了关于“人口地理学”的论文，概括了欧美国家的人口地理学研究状况(祝卓1991年)；1940年，德里斯(H. Dories)在德国《地理年刊》55卷上发表了《迁移与人口地理(1908~1938年)》的回顾性文章。上述表明，“人口地理学”一词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甚至更早些已经出现。

但是，在哈特向(R. Hartshore)、伍德里奇和依斯特(Woold-ridge, East)这些权威学者关于地理学性质和历史的评述中竟只字未提人口地理学(Jones 1981年)。由此可见，尽管从拉采尔算起，人口地理学研究已经有了上百年历史，但实际上直到20世纪中期，人口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在若隐若现阶段，发展微乎其微。

二次大战后，世界人口迅速恢复增长，人口学、地理学、城市科学的发展以及各国人口普查制度的建立，为人口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材料，从而使这一学科得到了长足发展。较早的人口地理学著作有乔治[法](George 1951年)的《人口地理模型引论》、博热·加尼尔[法](Beaujeu-Garnier 1956年)的《人口地理学》和木内信藏[日]的《人口、集落地理》。其中博热·加尼尔的著作曾经再版，并于1966年被译成英文，在欧美国家颇有影响(周之桐等1992年)。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人口地理主要著作有克拉克(J. I. -Clarcke 1965年)的《人口地理学》捷林斯基(Zelinsky 1966年)的《人口地理学引论》特莱瓦萨(Trewartha 1969年)的《人口地

理的世界模式》德姆科等 Demko, etal 1970 年的《人口地理学导读》波克希舍夫斯基(1987 年的《人口地理学》伍兹(Woods 1979 年的《地理学中的人口分析》库尔斯(1987 年的《人口地理学导论》琼斯 Jones 1981 年的《人口地理学》巴尔 Bahr 1983 年的《人口地理学》等。

人口迁移研究在 20 世纪仍有较强的独立性，成果也不少，较有影响的是伍伯特(Wolpert)的人口迁移的环境压力和地点效用理论(Woods 1979 年)，罗吉斯(Rogers 1975 年)的多区域人口迁移矩阵和迁移年龄模型等。

四、中国的人口地理学研究

我国人口地理学研究，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并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短暂间歇中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26 年，竺可桢发表于《东方》23 卷的《论江浙两省之人口密度》一文，是我国第一篇人口地理学论文。此后十几年，人口地理学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还有：翁文灏(1933 年)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张印堂(1934 年)的《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胡焕庸的《江宁县的耕地与人口密度》(1934 年)《安徽省的人口密度与农产区域》(1935 年)和《中国人口之分布》(1935 年)等(胡焕庸 1983 年)。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胡焕庸首先创制了我国人口分布密度图；其次划出了我国人口分布上最简洁的密度分异线：瑗瑛一腾冲线，该线分我国国土为东南与西北两壁，东南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36%，而人口占却全国总人口的 96%，西北地区(含蒙古)面积占 64%，而人口却只占 4%。经历半个多世纪后，这条线的性质仍一如当年，因而被国内外学者誉为“胡线”(Hu-line)。文中还阐述了我国移民的优选方向是东北地区。该文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价值，奠定了我国人口地理学，从而也是人文地理学的基础。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人口调查和研究均受干扰，成果零星，学科发展缓慢。解放初期，在胡焕庸、孙敬之等人的带领下，我国人口地理学开始复苏。然而 1958 年后，人文科学受到了歪曲和冲击，人口问题被视为禁区，人口地理学遂成覆巢中卵，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留下了 20 多年的空白。

1980 年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确定了人口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主攻方向，我国人口地理学又开始重新起步，并在短短 10 余年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胡焕庸、张善余(1982, 1984, 1985 年)，葛剑雄(1986 年)，朱宝树(1990 年)，祝卓等(1991 年)，周之桐、王桂新(1992 年)等学者已出版了人口地理学研究专著。学术论文更是与日俱增。据朱云成、陈浩光(1983 年)不完全统计，1979~1983 年已有人口地理学方面的论文 40 多篇。1983 年后，人口地理学论文更为丰富，据笔者的粗略搜索，1983~1985 年的 3 年间，国内报刊上发表的人口地理学论文共 240 余篇，大大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

统计表明(表 1-1):

1. 农村人口城镇化问题成为我国人口地理学研究热点。在所统计的 241 篇论文中，论述人口城乡分布的有 101 篇，占 41.9%，遥居榜首。1985 年以后，这股热劲仍在继续。在这类论文中，有 41 篇是论述农村劳动力过剩及其转移途径的，另外 60 篇是论述城镇化的发展、大城市人口控制与疏散等问题的。

城镇化问题研究之所以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热潮，大

致有两方面原因：

1983~1985 年我国人口地理学著译论文

表 1-1 篇数及研究领域分布

类 别	篇 数	比 重 (%)
1. 综合	18	
(1) 人口地理理论与方法	4	7.5
(2) 区域人口地理综合研究	14	
2. 人口分布	31	
(1) 人口数量分布	16	12.9
(2) 人口自然属性分布	8	
(3) 人口社会属性分布	7	
3. 人口迁移与流动	25	
(1) 迁移	10	10.4
(2) 流动	15	
4. 人口城镇化	101	
(1) 农村劳动力转移	41	41.9
(2) 城镇人口增长与控制	60	
5. 人地关系	29	
(1) 人口与自然资源	13	12.0
(2) 人口与生态环境	16	
6. 历史人口地理	16	6.6
7. 世界人口地理	21	8.7
合 计	241	100.0

注：据 1983~1985 年国内学术刊物及出版物的不完全统计。

(1) 特殊的人口经济发展阶段把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推向顶峰。由于 1962~1973 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都在 1978 年以后相继进入劳动年龄阶段，我国 80 年代经受了劳动力超额供给的巨大冲击。1982 年普查时，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有 5.51

亿人，占总人口的 54.9%；1990 年普查时，劳动年龄人口已增至 6.80 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更升至 60.1%，8 年中每年净增劳动力 1600 万人，年递增率高达 2.6%（图 1-6）。因此，80 年代是我国人口成年化，或“劳动力化”的过程。另一方面，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我国推出了一系列旨在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农业生产力的农村经营机制改革，大批长期被束缚于耕地上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走上与土地若即若离的生活道路。于是专家们紧张地核算中国到底需要“几亿农民搞饭吃”，接受农民季节性或常年性就业的小城镇成了备受关注的“大问题”而来自城市方面的种种信息又提醒地理学家、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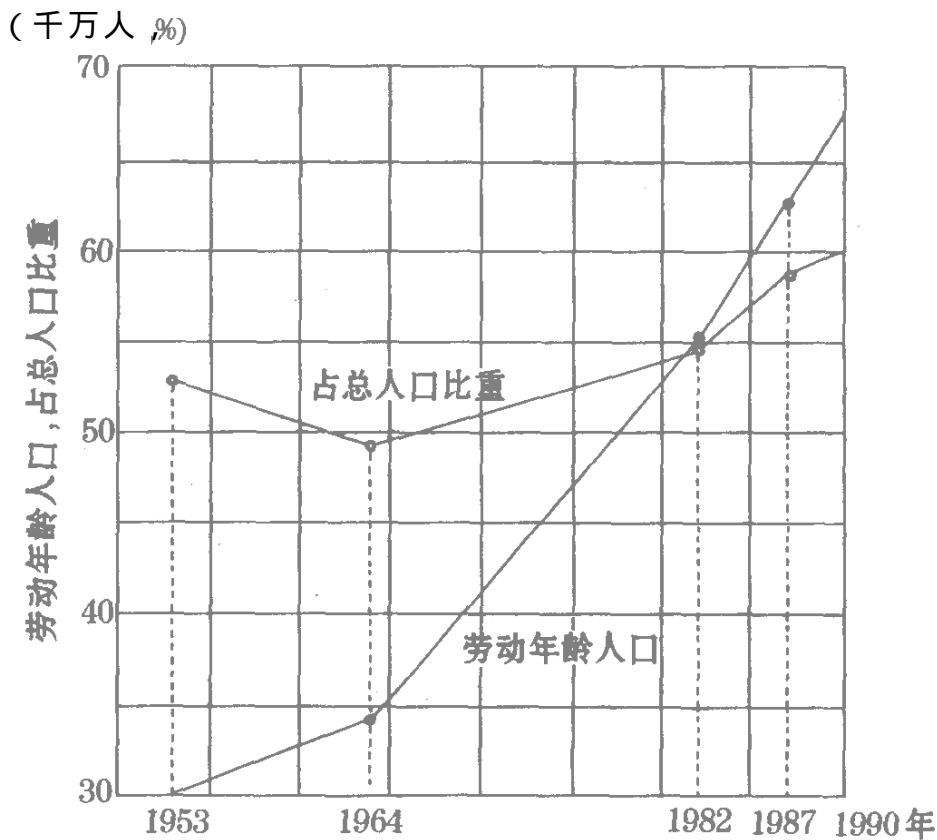


图 1-6 1953~1990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及其占总人口比重的演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1986 年，1988 年）；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等（1993 年）